

学术年谱

戴逸学术年谱

沈秋农 刘仲华

一九二六年，一岁。

九月十日(农历丙寅年八月初四)，出生于江苏常熟大东门青禾家桥王宅，起名戴秉衡^①。父亲戴礼鑫(后改名戴良耜)，在常熟县钱粮东柜从事钱粮征收工作。母亲王美龄。

一九四四年，十八岁。

七月，高中毕业。毕业纪念册《江苏省立第七中学第一届毕业纪念册》点评戴逸：“戴君秉衡，品学兼优，处己有律，待人方，温柔敦厚，可谓彬彬君子矣。君赋性颖悟，博闻强志，精明过人，好学勤研，故学业超群，于国学一科，造诣尤深，且因胸怀大志，有奋飞远图之思而深沉自抑，故溢而为文，多含奇气，在本级中高材捷足，可任重道远者，非戴君而谁欤？”^②

八月，报考上海交通大学，以第一名成绩考入铁路运输管理系。戴逸在《我选择了历史专业》《忆交大学风》中这样记录：“尽管我非常喜爱历史和文学，可当我高中毕业以后，并没有去报考文科。那时是抗日战争的1944年，当时，重理轻文的风气就很严重。人们的偏见、社会的舆论以及求职谋生的考虑，把青年学生大批地推向理工科。学文史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再说，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很多大学迁往内地去了，上海并没有好的文科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我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③“当时的交大，学生按成绩排座位，成绩好的坐在前面。我考入交

大铁路管理系的时候是第一名，又是班长，就被安排坐在第一排。”^④

一九四六年，二十岁。

七月十四日，《申报》刊发《北大清华南开联合招生》广告。这是北京大学第一次在上海招生，考场设在上海交通大学戴逸所住宿舍楼下。“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我没有多考虑，就报名投考北京大学史学系一年级。本意不过是试一试，不见得被录取。考试发榜，居然考上了史学系的正取生。”^⑤

一九四七年，二十一岁。

九月二十五日，北大学生院系联合会(后改称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通过决议，创办平民图书馆。这是一个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公开合法地收集和传播革命书刊的图书馆。戴逸积极参加创办图书馆的各项工作。

是年，戴逸因追求进步、崇尚真理，被吸收

① 1948年10月更名戴逸，本年谱以“戴逸”贯通全文。

② 《江苏省立第七中学第一届毕业纪念册》，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七月。

③ 戴逸：《我选择了历史专业》，《戴逸文集 学界记往》，第12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④ 戴逸：《忆交大学风》，《戴逸文集 学界记往》，第118页。

⑤ 戴逸：《我走上了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道路》，《戴逸文集 学界记往》，第136页。

为“民主青年同盟”盟员。同时,北京大学中共地下组织也将其列入入党考察对象。

一九四八年,二十二岁。

九月十二日,《华北日报》刊发《北平高等特种刑事法庭通缉奸匪嫌疑学生平市院校共一八一名》名单,其中北京大学38名,戴秉衡名列其中。

十月中旬,遭国民党特务拘捕后,由校长胡适保释。随后在地下党帮助下秘密离开北平。途中改名戴逸,寄寓逃离虎口之意。

十一月下旬,到石家庄正定县的华北大学报到,校长吴玉章。华北大学分设四个部,戴逸被安排在一部(政治部)17班学习。

一九四九年,二十三岁

一月下旬,华北大学一部第15—18班学员结业,戴逸填写的工作志愿是“历史研究”,被分配到一部政治研究室中共党史组当研究生。

三月,根据中央决定,华北大学向北平迁校。胡华带领助手戴逸、彦奇等同乘一辆“四野”大卡车从河北正定出发到达北平。

四月上旬,学校搬迁全部完成。校部驻东四六条胡同,戴逸所在一部分驻沙井胡同、蓑衣胡同、铁狮子胡同、棉花胡同以及西皇城根原华北文法学院等处。

一九五一年,二十五岁。

三月,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由北京新潮书店出版,至7月已第3次印刷。“《中国抗战史演义》一出,不胫而走,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全国好几个省级广播台连续播放此书,北京市委宣传部找我谈话,予以鼓励。”^①

一九五三年,二十七岁。

十月十七日,接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中国近代史教学工作。

一九五六年,三十岁。

六月四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报告,对金冲及、孙守仁所建议的分期标准进行商榷:“我主张把中国近代史分成三个时期:一、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873年云南、陕、甘回民起义被镇压,共三十多年,这是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和中国农民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二、从1873年至1901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辛丑条约订立,

将近三十年。这是外国侵略势力瓜分中国邻邦与本土和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时期。三、从1901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将近二十年。这是资产阶级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和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②

一九五八年,三十二岁。

九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戴逸表示:“这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此书内容叙述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在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农民战争尤其被我所注意。我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这次农民战争,弄清它的发生、发展、困难、矛盾,它所面临的问题 and 最后的失败。写作过程中,时时会想到我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感到两场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和类似,但其内容、特征、外貌、结局又如此之迥异。我深深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相似性、多样性、具体性。前后相续的历史不会重复,也不可比附。但太平天国运动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距不过几十年,却留下了许多非常相似的经验教训,我以前学习的革命史知识对我理解太平天国运动很有帮助。这就是,对现实知道得更多,对历史会理解得更深。”^③

一九五九年,三十三岁。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八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又称全国群英会)。

一九六〇年,三十四岁。

二月十七日,《在科学研究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发表于《人民大学校报》。文章介绍了其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近七年时间的经历与深刻体会:“1953—55年底将近三年时间,我的全部力量都投入中国近代史教学工作。当时我校已经招了一批研究生,领导上要我在一年之内准备上课。我当时刚到历史教研

① 戴逸:《我的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戴逸文集 学界记往》,第131页。

② 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③ 戴逸:《我的学术生涯》,《戴逸文集 学界记往》,第141—142页。

室不久,对近代史知识几乎是一片空白,而且一上场就是研究生的专业课,我心中感到很紧张,不敢接受这个任务。党支部一直鼓励我,给我指出‘边干边学’的途径,用我校许多新教师在二个月内开课的事例来启发我,并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使我能够专心备课。这一年的时间真紧张极了,每天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给了我信心和力量,使我的研究工作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使我能把科学研究坚持下来。从1956年初—1958年夏,我一面担负着教学工作,一面写出了三十八万字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有的同志问我:在教学任务很忙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挤时间写这样一本大书?当然,党支部和组内同志们热情支持我,给我匀出了不少时间,同时我的备课过程和研究过程是二而为一的。因此,备课和研究完全结合在一起了,这样既争取了时间,使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也保证了课程质量,使讲课内容,建立在较深入的研究基础之上。”^①

一九六一年,三十五岁。

一月十一日,《论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发表于《光明日报》,此文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一十周年而作。^②

一九六四年,三十八岁。

五月二十九日,与李文海、罗明合作撰写的《论“清官”》发表于《人民日报》,署名“星宇”。^③

一九六五年,三十九岁。

十月十五日,《写群众的历史 为群众写历史》发表于《历史研究》第5期,署名:夏芴。^④

十二月二十九日,由中宣部组织,与龚育之、邢贲思、林甘泉合作撰写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发表于《人民日报》,署名“方求”。^⑤

一九六六年,四十岁。

四月十四日,《文汇报》发表康立文章《〈论“清官”〉质疑》,对196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星宇《论“清官”》予以批判。戴逸回忆说:“1967年4月,上海写作组以康立为笔名撰文,点名批判星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全国报刊广泛转载。全国范围内批判清官的文章铺天盖地,其势汹汹。它们的论点是:清官更坏、更反动,因为贪官进行残酷剥削,能引起人们的反

抗;而清官同情人民,对人民反而有欺骗作用。这种牵强的逻辑实难令人信服。”^⑥

一九六八年,四十二岁。

八月二十二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行使全面领导,学校混乱局面暂时得到控制。戴逸回忆说:“工宣队进校之后……教师集中在一起,我和胡华等二十多人挤住在两间小屋中,每天劳动……但仍忘不了用剩余的一点微热去温暖别人被冻得快要凉透的心,真所谓‘涸辙之鲋,相濡以沫’。”^⑦

一九六九年,四十三岁。

十一月七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中共中国人民大学整党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在校整党领导小组之下,校部机关、系、所等单位共建立19个下属整党领导小组。戴逸回忆说:“(我)1969年幸而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我在那里被分配养猪,过了几年猪倌生活。”^⑧

一九七〇年,四十四岁。

一月十三日,中国人民大学后勤部门召集包括戴逸、胡华在内的第三批下放人员开会,作下放遣送报告,规定1月25日集中出发,前往江西余江“五七”干校。

一九七三年,四十七岁。

十月十日,中共北京市委、市革委会通知,“撤销中共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小组和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委员会。军宣队全部撤离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告结束”^⑨。

① 戴逸:《在科学研究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人民大学校报》1960年2月17日。

② 戴逸:《论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光明日报》1961年1月11日。

③ 星宇:《论“清官”》,《人民日报》1964年5月29日。

④ 夏芴:《写群众的历史 为群众写历史》,《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

⑤ 方求:《〈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9日。

⑥⑧ 戴逸:《我的学术生涯》,《戴逸文集 学界记住》,第144页。

⑦ 戴逸:《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戴逸文集 学界记住》,第12页。

⑨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编:《中国人民大学纪事(1937—2007)》上卷,第24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十二月,随同中国人民大学留在余江“五七”干校的最后一批教职工返回北京。戴逸回忆说:郭影秋于1972年“向北京市委建议成立清史研究小组,隶属于北师大,我校一部分搞历史和文学、档案、法律的同志得以在这一名义下聚集在一起,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清史研究工作”^①。“返回北京之后,批儒评法、批林批孔,仍成天在运动中过日子,但总算有了一点研究历史的时间。当时正值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外交部希望历史学界开展边界问题的研究,作谈判时的参考。我选择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一研究课题。投入约四年时间,对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做了详细研究,写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由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这是我的第二部代表作。”^②

一九七七年,五十一岁。

五月,《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限国内发行)，“编者说明”介绍“本书主要由戴逸同志执笔撰写”。戴逸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写道：“《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写作于中苏边境冲突之后,明显具有政治性。写作之时,我也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但我努力保持冷静的客观立场,力求从学术上研究中俄东段边界的沿革。”^③

一九七八年,五十二岁。

七月十三日,新华社发表长篇消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停办达八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恢复。”^④在复校后的三个月内,学校机构逐渐健全,校系各级领导班子成立,恢复和新建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等15个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清史等6个研究所。

八月十五日,《实事求是 勇于创新》发表于《历史研究》第8期。文章指出:“创新必须实事求是,而不是飘在空中,随心所欲,异想天开……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是尊重实践,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基础和出发点。我们应该树立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好风尚,要有抱负,有勇气超越前人的成就,攀登科

学的顶峰。我们的时代是革命变革的伟大时代……史学工作者要研究和总结这一伟大时代的历史,就不能只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不能满足于寻章摘句,简单地照搬、照抄、照转,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丰富生动的实际,开动脑筋,解放思想,用我们的全部才智精力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⑤

十一月十三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作出为大批干部和教师平反的两项决定。一项是《关于为遭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诬陷、迫害的大批干部和教师平反的决定》,另一项是《关于撤销、销毁反右倾运动中的四十六人材料的决定》。戴逸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诬陷之词等全部撤销,予以平反。

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史研究所成立。成崇德回忆:“戴逸代表所领导为清史研究所的工作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他说:长期设想是将本所建设成一个专业齐全、水平较高、既有分工又能合作的科研机构,并把编著大型清史作为清史研究所的长远的奋斗目标。”^⑥

一九七九年,五十三岁。

一月三十一日,《四个现代化的实践是衡量一切的权威》发表于《教学与研究》第1期。

五月一日,《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文章指出:“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对某种历史现象做一些赞美和歌颂……是要对历史现象做科学分析。历史内容是生动丰富的: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斗争;也有思想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政治制度和法律

① 戴逸:《哲人其萎 风范长存》,《戴逸文集 学界记往》,第43页。

②③ 戴逸:《我的学术生涯》,《戴逸文集 学界记往》,第145页。

④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编:《中国人民大学纪事(1937—2007)》上卷,第25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⑤ 戴逸:《实事求是 勇于创新》,《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

⑥ 成崇德:《清史研究和史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刘葆观主编:《在神州大地上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录(1950—2000)》下卷,第6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制度的演变,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等等……但是,阶级斗争并不是唯一的历史内容。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历史唯物论的一般常识。”^①

一九八〇年,五十四岁。

四月八日至十二日,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邀请戴逸等8位研究中国近代史专家举行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专题座谈会。

六月,《简明清史》第一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戴逸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说:“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鉴于社会上尚无一部系统、完整而篇幅适中的清史著作,我向郭影秋副校长建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著作,以便清理清朝近三个世纪的发展线索,探讨其中的重要问题,这样就开始了《简明清史》的写作。我担任该书的主编,投入的力量很大,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研究、琢磨了很多问题,该书初稿是集体写作的。我在审稿时逐章、逐节、逐句、逐字,几乎重新写定。七十多万字的篇幅,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这是我的第三部代表作。”^②

一九八一年,五十五岁。

三月五日,《要重视学习中国近代史》发表于《学习与研究》第3期。文章指出:“中国近代史是极其重要的学习项目。这是因为:第一、学习中国近代史,可以更加坚定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第二、学习中国近代史,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认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指导作用……第三、学习中国近代史,可以使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③

三月八日至二十日,由广东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组织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广州、桂平、桂林分段举行。戴逸参加会议并在《文史知识》第4期发表《金田起义出大湟》,文章在充分肯定金田起义的同时严肃指出:“我们歌颂历史上敢于起来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英雄,不愿意多讲他们的缺点、问题,可是,对农民过分美化,对农民的力量估计过高,也会背离历史的真实。”^④

九月二十九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清

史研究所所长,袁定中、李文海、罗明为副所长。

一九八二年,五十六岁。

九月中旬,《加强对清史的研究》发表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文章就以往对清史研究的成果及存在的谬误和缺陷作了介绍,对为什么要研究清史的意义作了阐述,指出:“把清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清王朝盛衰兴替的全过程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怎样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清代各种制度、政策、机构以及历史事件、思想潮流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因此,把三百年的清代历史当作完整的研究对象是很有必要的。”^⑤

一九八三年,五十七岁。

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承德市纪念避暑山庄建庄二百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举行。戴逸在发言中指出:“承德既是游览的风景区,又是我们进行生动的、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教材。不仅如此,承德避暑山庄还具有建筑、艺术、宗教、文物等多方面的价值。值得我们大力地从各方面加深对她的研究……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起避暑山庄学或承德学、离宫学呢?我想这门学科的建立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是客观的需要。”^⑥“山庄学的研究必将大大推动清史的研究。”^⑦

一九八四年,五十八岁。

九月一日至十五日,出席在联邦德国蒂宾根市举行的第二十九届欧洲汉学大会并作报告:《日记是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谈〈清史稿〉的编纂》。

十一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由苏州大学历史

① 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

② 戴逸:《我的学术生涯》,《戴逸文集 学界记住》,第145-146页。

③ 戴逸:《要重视学习中国近代史》,《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3期。

④ 戴逸:《金田起义出大湟》,《文史知识》1981年第4期。

⑤ 戴逸:《加强对清史的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

⑥⑦ 戴逸:《避暑山庄与清代政治》,《步入近代的历程》,第37-38、40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系和江苏省史学会发起的全国首届左宗棠历史评价学术讨论会在苏州大学举行。戴逸在题为《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发言中指出：“解放以来，对他（左宗棠）的评价有过很大变化。他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也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有功有过。他的功劳很大，收复新疆，保卫国家的神圣领土，反对外来侵略，对国家和民族有重大贡献。试想：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少了新疆一大片，那还成什么样子？收复新疆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这一点现在大家都是承认的。当然，左宗棠也做过错事、坏事，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屠杀了革命人民。千秋功罪，要加以比较的话，应该是功大于过。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历史学界对左宗棠的评价是完全否定或者基本否定的，只说他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卖国的洋务派，对收复新疆一笔带过，评价甚低。现在看来，对左宗棠完全否定或基本否定是不正确的，这个问题大体上已经澄清。”^①

一九八五年，五十九岁。

八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北京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社科所在怀柔联合举行纪念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戴逸以市社联副主任名义主持会议并作总结发言，他指出：“第一、要研究原始材料。抗战时期的材料浩如烟海，涉及的方面很多，有中国共产党的，有国民党的，有汪伪政权的，还有日本的。领域也很广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原始材料多，需要我们来整理，必要的还需考证……历史教学，可以使用第二手资料，历史研究，则必须使用第一手资料……第二、历史研究必须尊重事实，必须敢于坚持真理……抗战期间的党史研究具有很强的党性。我赞成‘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提法，研究和宣传应该适当分开……第三、学术研究要贯彻双百方针。双百方针是科学发展、文化繁荣的保证……政治性强的学科更应注意贯彻这个方针，应当让大家平等地讨论政治性的问题，造成一种学术民主的空气。”^②

一九八七年，六十一岁。

一月十五日，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岗位上退下来后被任命为名誉所长。“我

六十岁之后，从事两方面研究：清代边疆开发和乾隆帝。我国边疆的统一和发展是清朝完成的伟大业绩，因此，我们今天才拥有辽阔的版图、世界第一位的人口和比较巩固的统一国家。我和一些同志曾对清代的边疆和民族关系进行研究，这一课题被列入国家的六五规划。以后，我又对乾隆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产生了兴趣，写了《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199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四部代表作。”^③

七月十七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如何深入》发表于《人民日报》。文章指出：“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是指导近现代史研究工作继续发展的指南针……第二……古老的历史学科应该去开辟那些过去少人问津，而现在又为四化建设需要的边缘空白地带，以焕发青春、服务于现实……第三，要把中国近现代史放在世界史的广阔背景内加以研究……第四……进一步发掘史料的珍藏，对具体问题进行细致的考证、勘误、辨伪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用史料学去代替历史科学，但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的搜集、整理、排比、考证为基础……在大量、丰富而准确、可靠的史料基础上，才能有科学的历史研究。”^④

十月十日，《简明清史》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奖金优秀科研奖。

一九八八年，六十二岁。

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国史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戴逸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九月十六日，《失去了的机会——略论18世纪的中英关系》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① 戴逸：《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在左宗棠历史评价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② 戴逸：《在纪念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北京社联通讯》1985年第5期。

③ 戴逸：《我的学术生涯》，《戴逸文集 学界记往》，第147页。

④ 戴逸：《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如何深入》，《人民日报》1987年7月17日。转引自戴逸：《步入近代的历程》，第49-51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第5期,此文是为朱雍博士论文《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一书所作序言,对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觐见乾隆的外交接触,作了具体介绍和评析。

一九八九年,六十三岁。

三月二十八日,《改革大潮中的历史沉思——戊戌变法90周年感言》发表于《教学与研究》第2期。文章认为,回顾90年前的戊戌改革,我们应当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提高自身的认识,甚至可以建立一门“改革学”或“社会发展战略学”“现代化进程学”。^①文章指出,改革的进展和成功取决于四大因素:“第一、改革的成功要有大多数人的支持,这就一定要制定改革的理论、纲领,并广泛宣传,让群众理解改革的必要性和目标、步骤,吸引群众投身到改革中去,为之奋斗……第二、改革要在稳中求进。改革是个渐进过程,是新要素的逐渐积累。对现存事物不必要、也不可能使之在一夜之间全部改观……第三、执行改革的人,其品质和行为十分重要。改革是为人民、为社会谋利益,不是为改革者、执行者自身谋利益……第四、防止改革目标在实施过程中被扭曲。”^②

五月四日,参加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报告会并作《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学术报告,对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及其时代特色、重要思想和代表人物作了介绍。

一九九〇年,六十四岁。

六月七日,《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祭》发表于《群言》第6期。文章提出:“当此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之际,回顾历史,反思中华民族走过的路程,应该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学生中进行历史教育,使他们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激发爱国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③

十一月二十一日,《社会主义是中国一百五十年历史的选择》发表于《人民日报》。文章特别强调:“纵观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从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不选择这条道路,我们就不可能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独立

和富强,就不可能取得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一百五十年历史的总结,我们应当经常重温近现代历史,牢牢记住这一历史的结论。”^④

一九九一年,六十五岁。

四月十六日,《新中国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戴逸教授访问记》(记者周溯源)发表于《求是》杂志第8期。戴逸在文中指出:

今后10年应提倡深入具体研究,提倡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概括,写出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充分发挥历史科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当前特别要帮助人们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为什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认清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确立社会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

我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把当时的中国与世界作一比较研究,认识中国在近代以前的社会状况,找出中国在近代落后挨打的根源,这样的课题,从学术意义、现实意义上讲,都有价值。我想在这方面作点研究工作。^⑤

一九九二年,六十六岁。

三月十五日,《论乾隆》发表于《清史研究》第1期。文章指出:

我们研究乾隆帝,并不停留在对他政绩的讴歌或对他过失的谴责上,重要的是要理解他和他所处的时代。十八世纪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乾隆帝是当时

①② 戴逸:《改革大潮中的历史沉思——戊戌变法90周年感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2期。

③ 戴逸:《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祭》,《群言》1990年第6期。

④ 戴逸:《社会主义是中国一百五十年历史的选择》,《人民日报》1990年11月21日。

⑤ 周溯源:《新中国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戴逸教授访问记》,《求是》1991年第8期。

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留下了许多经济、政治成就、军事功勋和文化业绩,同时也留下了缺陷和过失……研究十八世纪及其人物为的是要弄清历史,理解现实,认识国情,增长智慧,坚定信心,选择正确的方向,迎着光辉灿烂的明天更好地前进。^①

八月,新著《乾隆帝及其时代》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戴逸自述“这是我的第四部代表作”^②,并在《前言》中说:“这不是一本乾隆帝的传记,也不是关于18世纪中国史的全面叙述,只是我在学习这段历史时所思所得的零散杂乱的记录……研究18世纪的中国是认识近代和今天的途径之一。迄今为止,历史学界对于18世纪中国的研究还很不够,我这本书仅是非常粗浅而零散的探索与尝试,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做深入、系统的研究。”^③

一九九三年,六十七岁。

八月十五日,《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发表于《清史研究》第3期。文章指出:“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看到了200年前在我们国家面前曾经出现的机会以及机会如何失去。一方面历史有其必然性,古老的中国在面临历史转轨的时刻显示出其内部结构的牢固顽强,反映在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上对于外来挑战和实行变革毫无认识,缺乏准备,难于适应,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各种人物和势力的影响,各种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在关键时刻的短见……他的对外政策是失败的,他没有觉察到盛世中潜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性和先进性。自我封闭,虚骄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研究乾隆朝对外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④

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中国史学界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戴逸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

一九九四年,六十八岁。

六月五日至七日,《李鸿章全集》第二次编

纂工作会议在合肥举行,戴逸出席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

《李鸿章全集》的编纂,是一项规模宏大的跨世纪文化工程,它的总字数是2200万字左右,从数量上讲,是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从李鸿章本人的地位来讲,他是19世纪下半期中国历史舞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主角之一。李鸿章地位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他所从事活动的时间长,活动的领域广,所做的事情多。

……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史。^⑤

一九九五年,六十九岁。

九月二十日,《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发表于《人民日报》。文章认为:“研究18世纪中国和世界就是要把中国和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改变中国史和世界史分隔和孤立研究的习惯……研究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可以反思过去历史,把握今后机遇,帮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更快更好地前进。”^⑥

一九九六年,七十岁。

一月十五日,《治史四要素》发表于《安徽史学》第1期。文章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脑子里要经常考虑一些事情,主要是四件事:一个是材料,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文采,一个是品德。我觉得搞历史、治史的人应该注意这些。”^⑦文章对治史四要素的重要性作了具体论述。

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历史学如何走向

① 戴逸:《论乾隆》,《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② 戴逸:《我的学术生涯》,《戴逸文集 学界记往》,第147页。

③ 戴逸:《前言》,《乾隆帝及其时代》,第I-II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④ 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⑤ 戴逸:《在〈李鸿章全集〉第二次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

⑥ 戴逸:《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人民日报》1995年9月20日。

⑦ 戴逸:《治史四要素》,《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

二十一世纪》发表于《光明日报》。这是该报“史学”专刊主编马宝珠和戴逸、林甘泉、张椿年三位史学家的座谈纪录。

一九九七年,七十一岁。

三月,学术随笔集《繁露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七月十五日,《我看张之洞》发表于《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文章指出:“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有名的洋务派,他在近代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从张之洞的一生来看,他是个复杂人物,他和近代史上许多人物一样,具有矛盾性格,他身上反映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反映了时代的特征。”^①

八月十日,《北京日报》刊发《让学术走向大众——〈学术随笔文丛〉笔谈》一组,其中戴逸的笔谈指出:

学术随笔在各种出版物中应该是个重要的品类,文章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中国传统的文风都是提倡精而短的……现在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这要从各方面提高,包括科学知识、伦理道德教育、音乐、美术的欣赏能力等等,我觉得提高群众的学术底蕴,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使群众能接近学术,理解学术。如果能有比较多的人对学术感兴趣,这就表明了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②

一九九八年,七十二岁。

一月十九日,《加强社会史的研究》发表于《人民政协报》。文章指出:“近年来,社会史的研究蔚然成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历史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社会史以探索群体生活为目的,研究社会构成、社会变迁、社会运行、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衣食住行、家庭婚姻、风俗习惯等。它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又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宗教、艺术等交叉渗透,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社会史所要研究的是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研究社会上的个别人物和个别事件……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更具普遍性、抽象性,对历史的影响更长远、更

深刻。它是历史长河中强劲的潜流,不是浮在表面上稍纵即逝的泡沫。它深入多数人的生活,关系到多数人的利害。”^③

五月十日,访谈录《爱国主义: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著名历史学家戴逸谈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记者孔祥焘、马章安)发表于《大众日报》。文章认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首先要反对崇洋媚外的思想。崇洋媚外的人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落后的、不好的东西。对于外国的东西,要分辨,要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应有民族自尊,自立自强,要在对外交往中保持民族气节,不能奴颜婢膝。其次,要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爱国主义不是极端民族主义”^④。文章指出:“爱国远不止表现在抵御外侮方面。从各个方面、以各种形式对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作出贡献都是爱国……爱国主义教育不能仅对青少年,要面向全民、全社会,老百姓心中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问题在于如何调动它。干部的言行对老百姓起着示范作用,从这一点来说,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干部尤为重要。应做爱国的模范,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干好工作,真正做人民的公仆。官僚作风、腐败行为与爱国主义是格格不入的。”^⑤

六月,适逢戊戌变法100周年,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在菜市口以西报国寺内建碑纪念,戴逸以中国史学会会长名义撰写《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碑记》。

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史学会和北京大学联合主办“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戴逸在致辞中说:“戊戌变法是中國实现近代化的早期尝试。中国的近代化是长期、艰难、曲折、复杂的过程,会碰到许多艰难险阻,遭遇种种挫折失败,需要越过无

① 戴逸:《我看张之洞》,《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② 王俊义等:《让学术走向大众——〈学术随笔文丛〉笔谈》,《北京日报》1997年8月10日。

③ 戴逸:《加强社会史的研究》,《人民政协报》1998年1月19日。

④⑤ 孔祥焘、马章安:《爱国主义: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著名历史学家戴逸谈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大众日报》1998年5月10日。

数急流险滩。因此,需要有正确的、符合国情的指导理论,有克服众多困难的战略策略,有团结坚强、为之冲锋陷阵的改革群体,有支持改革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基础。但是这一切,维新派均付阙如,戊戌变法是一场准备很不充分的政治运动。当年的维新派承担了一项自己难以胜任的任务……因此,戊戌变法的悲剧有其深刻的根源,是历史的必然。”^①

九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中国史学界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扬州举行,戴逸卸任会长并任理事。新一届理事会对其为中国史学会作出的贡献、高山景行的学格人格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会议选举金冲及教授为第六届中国史学会会长,选举副会长7人、秘书长1人。

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由中国史学会和常熟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常熟召开。戴逸出席研讨会并提交论文两篇:《千秋功过论戊戌》《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

十二月十五日,《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发表于《历史研究》第6期。此文是在中国史学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主题发言。文章指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特点和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六点:第一,进化史观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显著标志……第二,唯物史观的运用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伟大进步……第三,20世纪史学除了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以外,再一个特点就是理性的觉醒、理性精神的发扬……第四,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第五,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各个分支学科中进行开辟和创造,有重大建树,建立了历史学全面、系统的学科体系……第六,在20世纪,新史料大批发现,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以前任何朝代的发现。”^②

一九九九年,七十三岁。

三月十三日,《历史上的雍正》发表于《人民日报》,对雍正帝的主要功绩、重大过失、种种局限和继位疑点作了介绍和分析。

六月,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由辽海出版社出版。全书共9卷(《导言卷》《政治卷》《军事卷》《边疆民族卷》《农民卷》《经济卷》《社会卷》《思想文化卷》《对外关系卷》),

戴逸撰《导言卷》,并与人合著《军事卷》。

七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我的学术生涯》作为代序:“在这本集子里,我选了41篇学术文章……这本集子反映了我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代表我主要的学术观点与心得。”^③“清史是我毕生研究的专业范围。我前半生研究中国近代史,属于晚清时期。后半生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史,属于清前期和中期。这上下300年,包含着多少人物和史事,兴衰隆替,悲欢离合,胜败斗争,升沉起伏。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近现代,从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国家,有众多的经验教训可供汲取,有无穷的哲理遐想可以反思。我成天和这段历史打交道,研究它,熟悉它,热爱它,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它。”^④

十二月十五日,《应该建立“避暑山庄学”》发表于《高校社科信息》第6期。

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近代学术的特点》发表于《中国教育报》。文章认为,一百年来,中国学术至少有五个特点:“一、以进化论和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思想……二、中国百年学术是中西文化学术交流融合的产物……三、百年学术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四、理性方法的运用……五、近代学术高扬爱国主义精神。”^⑤

二〇〇〇年,七十四岁。

二月十五日,《清史研究》第1期发表《面向21世纪的清史研究——部分清史专家笔谈》,参加笔谈的有五位专家,戴逸在笔谈中说:“清朝作为全国性政权,存在268年之久,国祚绵长,人口众多,版图广大,其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是中国历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朝代,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⑥戴逸认为:

① 戴逸:《百年功过论戊戌》,《戴逸文集 清后期史》,第14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② 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③④ 戴逸:《我的学术生涯(代序)》,《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第1、1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⑤ 戴逸:《中国近代学术的特点》,《中国教育报》1999年12月25日。

⑥ 戴逸等:《面向21世纪的清史研究——部分清史专家笔谈》,《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

“今天,大型清史之编纂比过去任何时候,条件更加充分,时机更为成熟……我国修史,自唐朝以来均由政府主持此事。官设史馆,聘用人才,以成大业。盖因修史之事重大,内容繁富,工作艰巨,个人绵力,难以胜任。必须由国家倡导鼓舞,组织全国之力量,宽予经费,使得购置图书,聘请英贤之士,优给待遇,以解后顾之忧,俾其悉力从事,心无旁骛,假以时日,严以考成,必能完满成功。我相信:21世纪之中国必能完成此文化学术之伟业焉。”^①

四月十三日,《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发表于《人民日报》。文章从四个方面对清代如何开发西部及其经验教训作了论述:“清代开发西部的前提就是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定是开发西部不可缺少的条件,而西部的开发又反过来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清代西部开发以实行屯垦、发展农业为主……清代的西部开发,除屯田垦荒外,又利用边疆地区的优势,发展畜牧业和矿业。”^②文章指出:“18、19世纪,清代经营、开发西部经历200年之久,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已是成果卓著。西部的人口急剧增加,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东西部的联系交流更加密切,缩小了差距,民族凝聚力逐步增强,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这是超越历史上各代王朝的巨大成绩……清朝开发西部固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发生了重大的失误,遗留下后果深远的影响,这就是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③文章强调:“当今天我们对西部进行更大规模的开发时,必须牢记这一教训,把退田还林、保持水土、整治沙漠、美化环境作为西部开发的题中应有之义,列为头等重要的任务。”^④

二〇〇一年,七十五岁。

二月十九日,访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戴逸教授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时也》(李梦超采访整理)发表于《瞭望新闻周刊》第8期。文章指出:“清朝有近300年的历史,但迄今却没有一部正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曾数次计划纂修清史,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近日呼吁把纂修清史这一宏伟的文化工程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作为清史研究的专家,戴逸先生20多年来带领人民大学清史研

究所‘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在为大型清史的纂修作着准备,中国素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且大多是在盛世完成,他认为目前修清史的经济条件、学术条件均已成熟——盛世修史,应该把握机会,完成这一历史盛事。”^⑤

四月五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清史》编纂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专家学者有:季羨林、任继愈、王忍之、王鍾翰、蔡美彪、朱家溍、戴逸、李文海、龚书铎、马大正、王晓秋、朱诚如、邹爱莲、郭成康、成崇德、黄爱平等。学校前校长袁宝华、校长纪宝成、党委书记程天权、科研处处长贺耀敏出席座谈会。戴逸介绍了纂修《清史》的缘起和初步设想。与会专家学者认为纂修《清史》的时机和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学术条件、人才条件均已基本成熟,应尽早启动纂修《清史》的工程。

八月七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戴河接见部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并与他们座谈。座谈会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教授和陈先达教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代表参加座谈会。

十月十五日,为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所作《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发表于《瞭望新闻周刊》第42期。

十二月,戴逸等16位德高望重的教授根据学校领导的提议,联名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写信,汇报他们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学习“八七”讲话的感受和体会。

二〇〇二年,七十六岁。

二月十五日,《〈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发表于《清史研究》第1期。文章指出:“《清史稿》一书撰写时离清朝覆亡甚近,修史者大多为忠于清室之遗老,有很多谀扬清朝、反对革命之词。且当时清朝档案尚未清理,修史时多根据国史馆稿件,未曾利用原始材料,故价值较逊。

① 戴逸等:《面向21世纪的清史研究——部分清史专家笔谈》,《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②③④ 戴逸:《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人民日报》2000年4月13日。

⑤ 李梦超采访整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戴逸教授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时也》,《瞭望新闻周刊》2001年第8期。

又成书仓促,未能统一校改,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故而是一部有缺陷的史书……《清史稿》虽有重大缺陷,但这是由于历史原因和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参加修史的人已尽了极大的努力,而《清史稿》本身亦有相当之学术价值,未可一笔抹煞。”^①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考察中国人民大学,亲切看望学校的师生员工,并与师生代表进行座谈,戴逸向江泽民、李岚清等时任中央领导汇报了纂修《清史》问题。

七月十七日,《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发表于《中华读书报》。文章指出:“我研究康雍乾时期的历史,旨在客观地陈述其辉煌成就,并指出当时存在的许多弊端,并非生硬地抬高其历史地位。尽管康雍乾做出巨大的业绩,但他们是落在世界历史潮流后面的封建皇帝,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行程的滞后所造成的……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严重地阻挠了近代因素的成长……18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与国内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②

八月十三日至十六日,李岚清、胡锦涛、朱镕基、江泽民先后在《文化部关于报送〈清史〉纂修工作方案的请示》上圈阅同意,批准启动《清史》纂修工作。

十一月二十六日,参加文化部召开的《清史》纂修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大会,大会推举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任组长,提名戴逸为《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二〇〇三年,七十七岁。

二月二十五日,《构建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清史编纂工程启动感言》发表于《光明日报》。文章指出:“《清史》纂修是新世纪的一项标志性文化工程。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是非问题上讲政治,讲原则,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要坚持学术创新与发扬史学优良传统的统一,坚持尊重客观历史真实与反映时代精神的统一,坚持文化学术积累与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统一;

要做到材料丰富,叙事精当,观点正确,文字流畅;要组织专家研究新编《清史》的内容、体例、文字和编纂规划,经过充分讨论,继承传统史书的长处,吸收现代史学研究的成果,并结合清朝历史的实际情况,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做到思想性、学术性与科学性的较完美统一。”^③

六月一日,访谈录《盛世修史 传承文明——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历史学家戴逸教授》(记者周溯源 李孝纯)发表于《求是》第11期。戴逸向记者介绍了编纂《清史》的意义、已经具备的条件及工作方针。他指出:“为了确保纂修成一部高质量的《清史》,首先是坚持唯物史观,另外……要抓好几个关键性环节。一是挑选好人才……二是把项目落实到人,实行责任制。三是集思广益,集体讨论体例、框架结构等问题。四是写好样稿,作为范例。五是中期检查,严格把关……最后由评审委员会进行鉴定验收。”^④

七月十七日,参加“《清史》编纂暨编译工作座谈会”,作题为《清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的讲话。

二〇〇四年,七十八岁。

三月二十二日,《清史工程与修史人才》发表于《瞭望新闻周刊》第12期。文章指出:

清史工程启动已有一年之久……

如今,大规模修史的条件更加具备。指导我们研究的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这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武器,将能引领我们走向历史的深处。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相当宽松,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已有成效,研究成果已有较丰富的积累,研究人才正在成长,经济条件和其他物质条件大

① 戴逸:《〈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② 戴逸:《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17日。

③ 戴逸:《构建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清史编纂工程启动感言》,《光明日报》2003年2月25日。

④ 周溯源、李孝纯:《盛世修史 传承文明——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历史学家戴逸教授》,《求是》2003年第11期。

大地改善。这是修史的良好时机,也是提高清史质量的根本保证。其中人才问题尤为重要。应该说清史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要完成一项内容丰富、观点正确、史料翔实、文字流畅的大型清史著作,我国目前的高水平研究人才尚嫌不足。因此,如何识拔、团聚、培养和提高研究队伍,是完成修史任务的关键,也一直是我们关注和考虑的焦点。

……我们在实施清史工程时先要学习当伯乐,“知人善任”,选拔适当的人才……才能使研究成果具有高的质量。

……为此,清史工程决定试行研究项目招标制……许多研究项目确定项目名称、研究要求、篇幅结构、完成后,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标,以公正、公平、唯贤是举的原则,评选项目主持人,给以优厚的待遇和条件,俾能专心致志,投入修史工作。这样,依靠许多优秀项目主持人的共同努力,完成研究任务,写出高水平的清史著作。^①

三月二十七日,编委会召开《清史》传记试写样稿研讨会,戴逸在讲话中指出:“样稿是提高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要思想统一、体例统一、文风统一……样稿就起一个标兵的作用……这就是写作规范。”^②他特别强调:“我们这部《清史》最重要的是质量问题,成败利钝就在质量,这是我们的生命线。质量搞不上去不仅是每个人的事情,而且影响到集体的荣誉,影响到我们国家的荣誉……我们决不能辜负了国家的希望、人民的希望。”^③

四月十六至十八日,出席“图录组”在京召开的首次图片资料征集专家咨询会并在讲话中指出:

收图入史是新修《清史》的一大创新。图录的作用在于以图明史、以图补史、以图证史,即用图录反映人文历史,用图录补充文字历史,用图录形象地表现历史。^④

我希望能建立一个容量达10万张以上的图片资料库。在广泛收集图片的基础

上精选图片,选出比较精彩,具有历史意义,能够反映清代历史的图片上万张。要一边收集,一边编写,用两年时间完成收集,用两年时间编纂出来,争取在2007年底完成。^⑤

七月二十日,《清史〈文献丛刊〉、〈档案丛刊〉总序》发表于《光明日报》。文章指出:“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缥缈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⑥

八月六日,编委会召开传记人物名单讨论会,戴逸在讲话中指出:“传记目录的名单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分工写作的基础……我们现在的目录有3000人……感觉现在的目录有四个特点:第一,选人严格,比较有原则……第二,以时间为序,按时间排列……第三,以类相从,按照类别区分……第四,分别主次。分别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对于这个名单,我一方面比较满意,另一方面又有不满意的地方。最大的问题是与《清史稿》的面目颇为相似……好像是把《清史稿》简化了……帝王将相占90%,只有10%是其他人物。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变传记结构。第一个措施,是加强类传……第二个措施,是改变正传结构……要有一批非军政人物进入正传。同时,还要适当提高他们这些人物的字数级别……第三个措施,我主张搞合传、附传……它的好处,第一个是可以文

① 戴逸:《清史工程与修史人才》,《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12期。

②③ 戴逸:《在〈清史〉传记样稿研讨会上的讲话》,《戴逸文集 清史编务》,第124、123-12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④⑤ 戴逸:《在图录组图片征集会议上的讲话》,《戴逸文集 清史编务》,第127、131页。

⑥ 戴逸:《清史〈文献丛刊〉、〈档案丛刊〉总序》,《光明日报》2004年7月20日。

省事增……第二个好处是可以看到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①

十月三十日,参加编委会召开的《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并在讲话中指出:

《通纪》是整个《清史》最重要的部分,记载清朝近300年的全部历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重大事件,有300多万字,占全书篇幅的1/10。通纪既要展示近300年清朝历史的全貌,也会展示我们对清朝近300年历史的一些观点和评论。

……因此,通纪的质量一定要是精品,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水平,要经得住检验。

通纪部分第一个要求是观点明确,第二个要求是史料丰富准确,第三个要求是结构严谨合理,第四个要求是文字简明流畅、有可读性。^②

贯穿(通纪)全书的线索……第一,是对清朝历史的定位……我想我们这部书应该反映新世纪的观点……第二,必须用辩证的思想去对待历史……第三,要把清朝近300年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里来考察……第四,叙述史实要准确、丰满、清楚……第五,文字要简明、流畅、生动。^③

二〇〇五年,七十九岁。

一月十八日,致函李文海,谈阅读《灾赈志》纲要与样稿的体会:“条举目晰,简明有序。样稿‘义赈之兴起’写光绪初年北方各省之义赈,详叙其始末,列明主持人,赈灾区,赈银数,赈灾活动甚生动具体,颇有新意。赈灾为民生之重大问题,此篇以科学的目光总结赈灾经验,超越前史之《灾异志》。得此篇幅,可为新清史增色。”^④

一月二十二日,致函编委会各二级组(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当前修纂清史工程立项已过大半,2005年将有大半提纲、样稿及其他成果上交,对提纲、样稿等进行审读、评估,是编委会今后的重大工作任务。此项工作关系到全书的质量与修史工作能否胜利完成。今后各二级项目组将集中主要力量开展审读、评估工作。希

望大家在工作中探索和积累审读、评估的经验与方法,以有助于修成高质量的大型清史。”^⑤

五月十六日,编委会召开《清史》工程项目阶段性成果评估工作研讨会,对项目中心制定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阶段性成果评估验收办法》进行讨论。戴逸在讲话中指出:“对稿件进行评估是个非常重要、非常复杂的工作,关系到稿件的质量,我们能不能达到21世纪清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能不能成为精品,其中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评估……评估工作的好坏是工程成败的关键,也是编委会的艰巨任务,必须严肃认真,全力以赴,必须把评估工作做好。”^⑥

二〇〇六年,八十岁。

三月二日至三日,编委会召开通纪第四卷(乾隆朝)讨论会。戴逸在讲话中指出:“第四卷提纲写了很多问题……有些提法较新鲜,考虑较深入,也有些问题值得商榷……这一卷要写出盛世的气象和盛世的规模……要写它的经济发展、政治措施、军事实力和文化繁荣的程度。写盛世要实事求是,既不夸大、溢美,也不缩小、贬低,要有根有据,言之成理,有说服力。”^⑦

三月三日,编委会召开通纪第五卷(嘉庆、道光朝)讨论会。戴逸在讲话中指出:“这一卷是从乾隆盛世走向衰微……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既是传统封建社会的结束,也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乾隆时期已经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随之跌落下来,一落千丈。为什么跌落下来?因为乾隆盛世是建立在封建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的,内部包含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⑧

六月三十日,编委会召开传记组编纂工作会议,对传主总目录及若干试写稿、资料长编、

① 戴逸:《在传记人物名单讨论会上的讲话》,《戴逸文集 清史编务》,第139-144页。

②③ 戴逸:《在〈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戴逸文集 清史编务》,第148、149-155页。

④⑤ 引自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档案。

⑥ 戴逸:《在清史工程项目阶段性成果评估工作会上的讲话》,《戴逸文集 清史编务》,第173页。

⑦ 戴逸:《在通纪第四卷(乾隆朝)讨论会上的讲话》,《戴逸文集 清史编务》,第202页。

⑧ 戴逸:《在通纪第五卷(嘉庆、道光朝)讨论会上的讲话》,《戴逸文集 清史编务》,第212页。

考异予以讨论。戴逸对已读稿件谈了四点意见：一是《传记》的结构有重大突破，分别设立了列传和类传，各有1700多人，总计有3500位传主。增加类传的分量，使得士农工商都能进入正史，破除了官本位传统；二是许多下层人民进入正史，新传记挖掘出大量有才能有贡献的下层人民，为他们立传，使新传记不再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三是资料丰富，大量利用各种资料，包括档案、碑传、诗文集、各种官书、报刊及外文资料，是以前写传记的人难以做到的；四是设置的一套工作程序发挥了作用，即写作《传记》之前，先收集资料，编写资料长编，如有不同记载，应作考异，这一程序行之有效。^①

二〇〇七年，八十一岁。

四月二十六日，《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认为“和谐世界”至少有以下几点特征：“一，维护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通过对话解决矛盾，不采取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世界各国应平等相待，反对大国主义与霸权主义；三，经济上相互合作，互利双赢；四，承认和鼓励多元文明的共存，每个国家都有维护发展自己文明的权利，每种文明都有值得学习和欣赏的精华；五，追求天人合一，即保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追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文明强调‘和谐’，‘和谐’的本质是理解、包容、尊重，是和睦共处，和而不同……中国人民真诚愿意通过文明对话，将一个开放的、和平的、友好的中国展示给世界。”^②

七月十八日，参加编译组工作会议并讲话，认为编译组工作成果多、质量高、范围广、难度大，“编译工作对于我们《清史》编纂作用非常巨大，这就是给编译工作的定位。无论直接的作用，还是间接的作用，都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③。同时对编译组工作提出四点要求：“第一，开拓……用外国史料来研究中国，这是很有开拓性的工作……第二，创新……历史学的创新往往要靠新的资料……所以你们（编译组）工作可以帮助研究工作的创新……第三，守先……就是我们要保护先人留下的东西，对于其最好的保护就是翻译出来，影印出来……第四，待后，期待后人。清史工作我们这一代人做不完，几代人也做不完，代代相传。”^④

二〇〇八年，八十二岁。

二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序言》发表于《清史研究》第1期。文章指出：“李鸿章一生的活动几乎可以看作晚清历史的一个缩影……这样一部规模宏大、收集齐全，集三十多位专家，以14年之久，广搜精编的跨世纪史料文献的问世，对于推动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将会弥久而愈深。”^⑤

九月二十日，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并在致辞中指出：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三十年，目前，它的许多研究人员正全力以赴投入国家重点学术工程《清史》的编撰之中。

清史是历史学科中年轻的分枝，它历时三百年，内容丰富，资料浩瀚，变化迅速，道路曲折。它显示过自己耀眼的光辉而又充满了许多苦难与屈辱，清朝覆亡刚刚九十六年，距离今天很近，和现实的关系极为密切，它所包含的经验、教训对今天有着重大的启迪教育意义。^⑥

十一月二日，出席清史编委会、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等单位在北京举行的“清光绪皇帝死因研究报告会”，对检测过程的科学性给予高度评价。

十一月十五日，《光绪之死》发表于《清史研究》第4期。文章分析指出：“光绪和慈禧在政治上势不两立，矛盾尖锐……慈禧唯恐自己先死，光绪复出掌权，尽翻旧案……故临终前令亲信下手毒死光绪。从检测结果与史料记载来看，这也是事实的真相。”^⑦

① 戴逸：《在传记组关于传记编写若干问题的讲话》，《戴逸文集 清史编务》，第227-230页。

② 戴逸：《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4月26日。

③④ 戴逸：《在编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戴逸文集 清史编务》，第255、258-260页。

⑤ 戴逸：《〈李鸿章全集〉序言》，《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⑥ 戴逸：《感言》，《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⑦ 戴逸：《光绪之死》，《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

二〇〇九年,八十三岁。

五月二十日,与其他13位教授一起被聘任为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

六月四日至五日,参加“典志组”召开的第一次审改工作会议,出席《典志·礼乐志·乐篇》及《典志·文学艺术志·诗词篇》审改工作会。

十一月十六日,参加“清史纂修审改工作会议”,结合自己审阅、修改的30多篇、20多万字的稿件发表讲话,对审改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审改是《清史》纂修中一个很重要的步骤,目的就是要减少《清史》编纂中的差错,提高稿件质量。任何文章都要经过修改,甚至是不止一次的修改。审改是一个切磋磨合的过程,也是斟酌损益的过程。”^①

二〇一〇年,八十四岁。

九月二十日,在编委会主任办公会议上谈读通纪各卷稿件的印象:“通纪一直是我们的重点。今年以来已到交稿时限,现在交稿较多,已完稿者已达90%。通纪稿件的质量是第一要务,几个月来我都在阅稿,已阅近120万字,约占全稿的1/3……阅前忧心如焚,怕内容不如理想,差距太大,虽大力审改,仍难副人望;阅后心稍宽慰,感到大部分稿子写得相当好,好多卷可能进入优秀之列。”^②

二〇一一年,八十五岁。

四月十四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向戴逸等5位新聘任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戴逸在受聘仪式后的座谈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十二月十四日,参加编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

清史工程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五个主体工程146项,现在交稿的已经将近95%,今后我们的主要力量就是审改,实际上现在已经大规模铺开,有的进入一审,也有的已经完成一审验收进入二审。

清史是一部集体创作,审改工作非常重要,个人著作要想成为精品都要反复修改,何况集体著作?质量重于泰山,质量就是生命,质量第一。我们虽然收到95%的稿件,但以后的审改任务十分繁重,十分

艰难,甚至要进行三审三验,共进行三次审改,三次验收,一共六道关口。要反复打磨,打磨一次就能够提高一次,争取达到应有的水平。^③

二〇一二年,八十六岁。

一月十一日,参加2011年度工作总结并发言,对清史工程146个项目的“三审三验”提出要求。

二〇一三年,八十七岁。

一月二十四日,参加2012年年终结会暨审改工作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现在大家都很努力,审改工作进度加快,初稿已经完成95%,85%的项目已经进入一审。自己这两年来看了30部稿件,约1000万字,主要集中在通纪、图录、传记部分。看稿件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质量,检查错误,从而为下一阶段工作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质量问题是首要问题,直接决定清史工程成败。国家工程必须精益求精,必须代表时代水平,必须是传世之作,必须无愧于国家,无愧于后代。”^④

十二月十七日,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教授因其在清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获此奖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颁奖。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宣读颁奖词。

二〇一四年,八十八岁。

五月十九日,编委会召开组长工作会议。戴逸作《〈清史〉三审合成阶段的工作展望》讲话,指出:“《清史》纂修已经历11年半,现在进入了新阶段,144个项目初稿成果已全部提交,完成二审项目已有135个。现在启动三审合成工作,也就是进入收官阶段。我要强调收官阶段的重要性……我要求三点:第一努力工作,全力以赴,不能有丝毫懈怠;第二细致谨慎,小心翼翼,切忌

① 戴逸:《如何进行审改工作》,《戴逸文集 清史编务》,第333页。

② 戴逸:《自我评估,加速前进》,《戴逸文集 清史编务》,第365页。

③ 引自2011年12月14日会议现场讲话录音整理稿。

④ 引自2013年1月24日会议现场讲话录音整理稿。

粗枝大叶;第三要有全局观念。在合成阶段不是一个一个小组关起门来各干各的,而要通力合作。不能只顾自己的小局,而要加强全局观念、整体观念,各组友好合作,才能胜利完成任务。”^①

二〇一五年,八十九岁。

十月,为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所作《中日甲午战争与世界历史》被编入《清史镜鉴——部

二〇一六年,九十岁。

三月十七日,参加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全体专家会议,对今后两三年的工作任务及时间安排做出规划,要求再接再厉,保质保量完成《清史》编撰全部工作:“我至今看了大概70本已经完成二审的稿件,没有仔细核对材料,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但也喜忧参半。喜的方面,经过二审,质量上了一个台阶,比初稿好得多。忧的方面,一些稿件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错误还非常多。希望大家在以后的三审中再接再厉,全力以赴,努力把错误减少到最低……三审包括查矛盾、查重复,三审之后还需要一个全书整合的程序。最终,《清史》的全部工作能在两三年之内完成。”^②编委会各副主任、《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主任参加会议。

二〇一七年,九十一岁。

一月十六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戴逸等文化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刘云山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清史》纂修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相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戴逸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不仅为《清史》纂修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史学界的优秀人才,取得了累累硕果,希望戴逸教授保重身体,继续圆满完成《清史》纂修任务,为中华民族留下一笔宝贵财富。

九月十六日,委托长子戴寅向常熟有关方面转达建议:常熟理工学院文学院(现苏州工学院师范学院)可开设清诗研究基地。

二〇一八年,九十二岁。

九月二十七日,常熟许霆、沈秋农前来拜访,接受翁同龢纪念馆“翁同龢研究会顾问”聘书,与来访者就有关问题作了访谈。

十月,人民出版社完成全部106卷(105册)《清史(送审稿)》印制工作,并送中宣部审读。

二〇一九年,九十三岁。

一月十九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共同举办的“启蒙先驱文化巨擘——纪念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暨《梁启超全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戴逸出席座谈会并在讲话中指出:“说到改革、改革家,晚清的洋务运动里,主事者没有谁明确提出‘改革’一词。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这对师徒发起‘维新’,才提出要‘大变,全变’,也就是后来讲的‘改革’。今天大家都在谈‘改革’,谈‘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追根溯源,可从康梁开始。”^③

二〇二〇年,九十四岁。

十一月二十七日“《戴逸文集》发布会暨戴逸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在常熟举行,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成崇德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分别作题为《戴逸先生与清史纂修前的准备工作》《戴逸先生与〈戴逸文集〉》的致辞。成崇德在致辞中指出:“从时间上划分:1966年以前,戴逸先生曾多次参与了国家清史编纂的准备工作;1972年,戴逸等清史专家被调入北京师范大学,成为清史研究小组成员;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小组回到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戴逸先生以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作为清史纂修基地,开展各种类型的科研项目和各个层次的人才培养,为清史纂修作前期准备。总的来说,1978—1998年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准备时期;1998—2000年是学术成果集中出版时期;2000—2002年是呼吁国家修史,为清史纂修进行学术准备,清史编纂方案论证时期。2002年8月,中央正式批准清史纂修方案,12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2003年1月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

① 戴逸:《〈清史〉三审合成阶段的工作展望》,《戴逸文集 清史编务》,第402页。

② 戴逸:《在编委会全体专家会议上的讲话》,《戴逸文集 清史编务》,第411页。

③ 谭洪安整理:《梁启超是中国和东亚的,更是世界的——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纪念暨〈梁启超全集〉出版座谈会纪要》,《中国经营报》2019年3月4日。

开清史编纂启动会议。2003年至今,是清史编纂时期。”^①黄兴涛在致辞中指出:“《戴逸文集》体现了戴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博大精深的学识,凝聚了他近70年来为中国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具体说来,我以为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涵括了戴逸先生推动和见证新中国历史学科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清史学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学术论著……其次,戴逸先生领衔为国纂修清史,《戴逸文集》中也留下了珍贵记录,这主要体现在《清史编务》部分,此乃他的工作实录……第三,戴逸先生对18世纪中外历史的整体性比较研究,为全球视野下比较史学的系统开拓做出垂范,是领军的、颇有远见的推动者和开拓者……第四,《戴逸文集》还贯注了作者经世致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史家情怀。”^②

十二月,《琴川集:戴逸自选集》被列入“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设三辑:“史学研究、文化研究及其他”“清前期、中期历史文化”“晚清历史研究”,共收录戴逸在史学理论、文化研究和清史专论等方面的重要文章40篇,横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

二〇二一年,九十五岁。

十月,作品系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分三种:《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为什么要学习中国近代史》《中华文化的历史遗产》《学史入门》,每种均按照不同主题分设五辑。

二〇二二年,九十六岁。

一月,《戴逸看清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编两册,第一册选编文章20篇,主题为“破解三百年历史谜团”;第二册选编文章26篇,主题为“探寻历史走向与细节”。

十月,在接受张建斌采访时指出:纂修《清史》自始至终坚持四个要求:科学性、真实性、丰富性、创新性,并“希望这部书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在历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代表21世纪的最高学术水准”^③。

十一月,中宣部理论局印发经中央领导同

志批准的《〈清史〉审读总意见》,要求以审读意见为基本参考,认真组织做好清史修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编纂任务。编委会认真组织研读《〈清史〉审读总意见》,召开主任办公会、组长办公会深入讨论,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研究制定了《〈清史〉编修工作实施方案》。

十二月十八日,因高龄体衰,感染肺炎,入住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治疗。

二〇二三年,九十七岁。

五月十九日,人物通讯《戴逸:含霜履雪至涓水汇洪流》(作者阴志璟、禹琳)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校报》。

二〇二四年,九十八岁。

一月二十四日,上午8时12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历史学家,新中国清史学科奠基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教授因病在北京逝世。

一月三十日,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作者简介】沈秋农,中国清史南方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地方志、地方抗战史及档案资料研究,主要著作有《常熟抗战史印》《铁蹄下的江南名城:常熟老人口述日军暴行》《激流中的呐喊:常熟文化叙事1915—1945》等;刘仲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清史、北京史研究,主要著作有《辇毂之下:清代北京五城行政与城市治理》《汉宋之间:翁方纲学术思想研究》《世变、士风与清代京籍士人学术》等。

① 成崇德:《戴逸先生与清史纂修前的准备工作》,《中华读书报》2021年2月3日。

② 黄兴涛:《戴逸先生与〈戴逸文集〉》,《中华读书报》2021年2月3日。

③ 张建斌:《奋进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戴逸与清史研究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